

“自我”的诗学： 沈从文小说中的空间想象与时间意识

朱兆斌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二元对立结构内蕴着一种深刻的“自我”的诗学。沈从文的小说中有两种“自我”,第一种为沈从文认可的“自我”,即乡下人的“自我”,这种“自我”在乡村空间中借由边缘意识与本真意识表达出来;第二种则属于现代人,表现为现代城市文明冲击下人之自我的异化。前者在空间想象中表达着沈从文对其自我意识的审美确证,后者则在时间意识中表现着现代人之“自我”的困境与矛盾。“自我”的诗学源于乡村文明,强调人之为主体的主体性与本真性,由此形成对现代性的批判。

[关键词] 沈从文;自我;空间想象;时间意识;批判性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8)05-0076-06

沈从文小说中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或两极对立)特征,而这一特征也成了解读沈从文小说的惯常思路。不过,这种解读思路也常受到质疑。例如王德威,他“不同意以往沈从文研究中常见的两极对立,诸如城与乡、今与昔、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浑然天成的乡村美德与腐朽没落的城市价值、无所不包的自然而变化莫测的文化等”^{[1]30},他认为“这些二元对立或能建构沈从文作品的梗概,但它们过于浅白,不足以说明沈真正的魅力所在”^{[1]130}。这种质疑并非否认沈从文小说中存在二元对立,而是认为仅此难以阐发沈从文作品的文学魅力。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探讨二元对立这一表层结构下面的深层逻辑。乡村与城市的对峙作为沈从文小说中基本的二元对立结构,不仅展现了沈从文的空间想象,还表达了他的时间意识。不仅如此,其中还内蕴着一种深刻的“自我”的诗学。这种“自我”不仅传达出沈从文本人的自我意识,还展现出集体性自我的状况。

一、空间想象中的自我意识及其展开

乡村与城市的对峙,是沈从文小说中空间想象的基本结构。就惯常的认识而言,这种城乡对峙揭示了沈从文在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的时代隐忧,即自

然而纯真的乡村文明逐渐被缺乏自然性与本真性的城市文明所侵犯与挤压。这种认识构成了理解沈从文的自我意识的文学表现的前提。正是在城乡对峙的二元对立结构中,沈从文完成了对自我意识的文学确证。

沈从文的自我意识,首先表现为从空间层面对自我身份的确认。沈从文始终坚持着“乡下人”身份,这一身份贯穿其整个文学世界的建构过程。他说:“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称,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2]223}因此,乡村才是沈从文的空间归属,他以“乡下人”的身份拒斥着城市的社会空间。文学不仅是沈从文想象世界的方式,还是其表达自我意识的方式。就此而言,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乃是自我与世界(城市社会)的对立。乡村构成了自我的理想空间,而城市则构成了外在于自我的异化空间。因此,“乡下人”,不仅是沈从文对自我身份的确认,还是对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的拒绝。

对沈从文而言,乡村不仅是地理空间,还是文化空间与精神空间。乡村,使沈从文免除了“无根”

[收稿日期] 2018-05-10

[作者简介] 朱兆斌(1994-),男,河南新乡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文艺理论与现当代文学。

的焦虑。作为“根”的乡村,具有文化与精神的双重内涵。就文化层面而言,乡村以原始与自然的姿态疏离城市文化的人为性与紧张感,在一种风景柔美与人情醇厚的环境中建构着一个日趋边缘化的文化空间。而就精神而言,乡村意味着人之性情与行为的纯粹与本真,人们在自然交往之中建构着一个乌托邦式的道德空间。对乡村空间的认同与向往,与沈从文自身的成长密切相关。沈从文在出生之地,“逃避那些枯燥书本同一切自然相亲近”^{[2]11},这构成了他“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2]11}。沈从文正是通过建构一个自然化的“湘西世界”回归自我的童年,在自然与心灵的描画中勾勒着自我的精神图景。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的:“有人用文字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2]222}具体而言,沈从文在乡村空间的文学想象中表现的自我意识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边缘意识,其二是本真意识。

边缘意识体现在沈从文对“边缘话语”的建构之中,以“湘西世界”为代表的乡村空间集中展现了这种边缘意识。乡村之作为边缘性的存在,乃是就现代化浪潮而言的。费孝通曾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3]1}乡土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然而,随着现代化浪潮的展开,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对峙逐渐形成。不仅乡村的原始景观与自然风貌逐渐被社会活动与人为设施取代,乡村文明中的纯真人性与淳朴民风也遭受着城市文明中的功利与欺诈的威胁。因此,乡村与城市的对峙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对峙,还是文化空间与精神空间的对峙。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的边缘意识还体现在一种独特的创作期待上。他在《边城》的“题记”中写道:“这本书的出版,即或并不为领导多数的理论家与批评家所弃,被领导的多数读者又并不完全放弃它,但本书作者,却早已存心把这个‘多数’放弃了。”^{[4]389}在此,沈从文显示出对某种占据主流地位的力量的排斥,而期待一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少数者。而他所期待的,或许正是以少数批判多数、以边缘抵御主流。

如果说边缘意识是就空间地位或势力而言的,那么本真意识则是就文化与精神的特质而言的。而这两种意识在沈从文这里具有极大的相关性,即处于边缘地位的乡村空间就意味着本真性的存在。夏志清曾注意到这一点,他指出,沈从文“能在这种落后的甚至怪诞的生活方式下,找出赋予我们生命

力量的人类淳朴纯真的感情来”^{[5]162}。沈从文以“乡下人”自居,正体现了这种边缘意识与本真意识对自我的确认。也正是边缘意识与本真意识,建构着沈从文作品中“自我”的诗学。“自我”的诗学对本真意识的突显,表现为对生命感觉的关注。其与边缘意识的联系在于,只有作为边缘空间的乡村,才是沈从文认定的最佳呈现空间。正是在乡村空间之中,生命的感觉显露为对心灵自由的向往与原始欲望的放纵。

沈从文对心灵自由的向往,乃是对原始而自然的乡村空间的肯定。在他看来,正是这种乡村空间,才使得人们心灵自由而具有纯真的人性。沈从文这么描写翠翠:“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4]393}在理想的乡村空间,人们有着发自内心的善,而未被城市中的急功近利异化。水,是沈从文作品中极为广泛的重要元素。沈从文曾说:“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2]13}水不仅是沈从文基于乡土文化的民间情怀的表达,还隐喻着从容而自由的生命状态。沈从文怀抱感情塑造的乡下人,如翠翠、萧萧、三三等,都具有水一般的灵魂。

原始欲望常常为现代的理性精神所压抑或排斥,而正是在此,沈从文展现了冲击现代文明之理性内核的一面。当然,沈从文作品中原始欲望的放纵并非一种以彻底性的非理性狂热对理性文明的冲击,而是建立在自由心灵之上的原始欲望自然而然的流泻。譬如,在乡村空间,沈从文对妓女这一为现代城市文明刻意排斥与掩盖的角色重新给予尊重,而这尊重正是建立在对自由心灵与自然人性的尊重之上的。在乡村空间,虽然妓女也以自己的身体进行交易,但她们却依然有着真挚的感情。当其与水手结下感情之后,“情感真挚痴到无可形容,男子过了约定时间不回来,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4]398}。这种情感展现着乡村中诗一般的男女关系,正是其自然性与本真性,使得人们难以用城市文明中的理性价值观来进行判断。在沈从文看来,城市文明中的理性价值观之所以常常批判情欲,乃是因为其判断的对象是城市中的情欲。正像《媚金·豹子·与那羊》中写的,在城市中,“爱情的字眼,是已经早被无数肮脏的虚伪的情欲所玷污,再不能还到另一时代的纯洁了”^{[6]112}。乡村文明中的情欲正具有来自自然的纯洁性,因而城市文明中的理性价值观是无法加以评判的。

沈从文在空间想象中呈现的“自我”的诗学,乃是通过边缘意识与本真意识的充分表达来进行自我意识的审美确证。换言之,沈从文对作为边缘空间的乡村的赞美,对翠翠、顺顺、二老、大老、萧萧、三三等乡下人的抒情性描写,都是对“自我”——一个“乡下人”的肯定性确认。

二、“自我”在时间意识中的 异化与矛盾

沈从文的小说中有两种“自我”,第一种为沈从文认可的“自我”,即乡下人的“自我”,这种“自我”在乡村空间中由边缘意识与本真意识得到表达;第二种则属于现代人,表现为现代城市文明冲击下人之“自我”的异化。而后者,正是沈从文在时间意识之中对现代人之“自我”陷入困境的确认。在这种自我的异化中,沈从文展现了“自我”的诗学中深刻的文明反思。

沈从文的批判来源于其作为“乡下人”的“自我”无法与社会现实达成共识。具体而言,在沈从文看来,社会现实正在塑造着一批批异于乡下人的城市人,而这正逐渐成为时代趋势。沈从文对时代的感知是敏锐的。他面对着城市,感叹道:“人与人关系变得复杂到不可思议,然而又异常单纯地一律受钞票所控制。”^{[2]227}城市确实在朝向理性化与功利化方向发展。正如一些社会学家指出的:“在城市中,尤其是大城市中,人类联系较之在其他任何环境中都更不重人情,而重理性,人际关系趋向以利益和金钱为转移。”^{[7]23}而正是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追求,使得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城市的发展,社区中人与人的联系中,间接关系,或称次级关系(Secondary relation)已经取代了原来的直接关系、面对面的首属关系(Primary relation)。”^{[7]24}在以往,人们的交往大多在本能与感情的领域自然进行,这是生活习惯所致,而非抽象的理性安排。而如今,许多人在城市之中毗邻而居,却多年互不相识。在此,以往的亲密关系与道德秩序被削弱了。其实质在于,“在城市环境的影响下,人们对地方的依恋感情被破坏了,首属团体中原有的抑制作用和道德训诫被削弱了”^{[7]26}。因此,城市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德空间,而成为了以某种功利目标为核心的竞争空间。

以进化论思维来看,乡村意味着封闭、落后而无生气,而城市则意味着开放、进步而生机勃勃。沈从文的时代反思正与进化论思维相反:乡村才是开放与生机勃勃的空间,城市则是封闭而无生气的

所在。在沈从文看来,城市人的自我并非在所谓的进步中日臻佳境,其真相在于其陷入了现代困境之中。在此,沈从文的时间意识摆脱了进化论的线性进步观,而具有了反思现代性的意义。沈从文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8]43}乡村与乡下人的身份,是沈从文进行文明反思的思想支点。正是以乡村文明的自然性与本真性作为参照,城市文明才露出了令人忧虑的一面,城市人的自我困境才显现出了严峻性。

城市人的自我困境在于,在逐渐丧失自然性与本真性的过程中被城市文明所裹挟。如果说乡下人与自然保持着和谐关系的话,那么城市人则丧失了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譬如,在乡下人这里,狗与人的关系是一种近似于伙伴的关系,而在城市人这里,狗与人的关系则几近于工具性关系(宠物几近于玩具,看门狗几近于门铃或监视器)。因此,乡下人与狗的关系当然处于和谐状态,而城市人与狗的关系实际上并不和谐。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三三曾想:“你城里人只怕狗,见了狗也害怕,还笑人,真亏你不羞。”^{[4]16}三三不知,这正是人与自然(包括动物)的关系发生改变的结果。在沈从文笔下,病也是区别乡村与城市的现象。城市人常来乡村养病,而在乡下人看来,城里人的病已然多到他们没听过的程度。以至于乡下人认为,“城里人欢喜害病,所以病的名字也特别多”^{[4]18}。可见,丧失自然性与本真性,已然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城市人的自我困境不仅表现在丧失自然性与本真性引起的生活变化上,还表现在精神层面的自我异化上。在城市题材的小说中,如《八骏图》《有学问的人》《绅士的太太》《知识》《顾问官》《王谢子弟》等,城市人的自我异化得到了充分展现。《八骏图》由达士先生的见闻展开,使得知识分子的扭曲心理与异化人格暴露于外。教授甲对艳体诗文、半裸女性广告颇有兴趣,教授乙则投趣于女郎的足迹及其中的贝壳,教授丙爱欣赏古希腊女神雕像画之凹凸之处,而教授丁爱对女性及两性关系高谈阔论……这些城市知识分子在日常行为中暴露出性心理的扭曲,与《边城》中的天保远行、傩送夜歌的自然深情具有强烈的反差。作为主要人物的“八骏”之一的达士先生,集中体现了心理的扭曲与道德的虚假。未婚妻瑗瑗与黄衣女子,后者激发了他的欲望,前者则以道德力量束缚着这种欲望。达士先生

在徘徊之后,最终选择了一场艳遇。沈从文在此意在揭示城市文明对人性的压抑与扭曲,人失去了自然性与本真性,自我异化了。

时间意识使得沈从文小说中两种文明(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构成了新旧层面上的可比性,沈从文对城市文明令人忧虑之一面与城市人自我困境之严峻性的揭示实际上正是建立在这种比较之上。不过,正如前文所述,乡村空间是以本真性与原始性为特征的。就本真性而言,城市文明中的扭曲与异化显然使其在乡村文明的自然与纯真面前丧失了其所谓进步的骄傲。而就原始性而言呢?前文曾指出,沈从文小说中的原始欲望的放纵并非一种以彻底性的非理性狂热对理性文明的冲击,而是建立在自由心灵之上的原始欲望自然而然的流泻。不过,沈从文小说中还有另一种原始性,这种原始性表现为人们集体生存之中的原始性。譬如,习惯往往成为裁判事件的依据。沈从文写道:“水面上各事原本及其简单,一切都为一个习惯所支配。”^{[4]399}再如,肉搏也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沈从文写道,人们多佩戴短刀,“遇不得已必需动手,便霍地把刀抽出,站到空阔处去,等候对面的一个,继着就同这个人用肉搏来解决”^{[4]400}。甚至在《渔》中,还有着杀人吃人的乡村习惯。沈从文写道:“矛尖穿着人头,唱歌回家,用人肝作下酒物,此尤属诸平常事情。”^{[4]2}在此,乡村的原始性呈现为一种野蛮性,而这正是乡村文明的软肋。固然,沈从文作品中更多地突显了具有自然性与原始性的乡村的正面意义。譬如,人与人之间具有城市无可比拟的善与义。沈从文写道:“凡帮助人远离患难,便是入火,人到八十岁,也还是成为这个人一种不可逃避的责任!”^{[4]402}然而,这种善与义,是和原始性的习惯与野蛮性的肉搏同时存在的。易言之,乡村文明并非一种理想状态,在严格意义上,只有在强调本真性的层面上才能将乡村空间视为沈从文的理想世界。

城市文明丧失了乡村文明之本真性,由此沈从文展现了现代人之自我的异化。在此,“自我”的诗学仍然具有明晰的取向,即对乡村文明的肯定与向往。然而,沈从文小说中还呈现了乡村文明中的野蛮性,这种原始的野蛮性构成了乡村文明的软肋,而正是城市文明对此予以解决。在此,似乎正是城市文明去除了“自我”的诗学中的野蛮性。乡村文明具有本真性,却携带着野蛮性;而城市文明去除了野蛮性,却也丧失了本真性。何去何从?沈从文不曾直接提出这一问题,但其小说却隐藏着这一难

题。正是这种矛盾,使得沈从文所认可的“自我”——乡下人的“自我”难以实现。因为这种矛盾实际上并非一个难题,而是一种时代的必然趋向,即朝向城市文明进发。历史在此没有陷入这种看似矛盾的难题之中,它以永不停息地运转回答了这一问题:“自我”已然无法全然回到乡村文明,人们能做的只是使城市文明在丧失乡村文明意义上的本真性之后,不再去建构另一种乡村文明不曾具有的野蛮性。而这,已然超出了沈从文的思考范围,但却可由其小说引发。

三、“自我”的诗学: 思想内涵与批判性

沈从文小说中具有两种“自我”,呈现出一种乡下人之“自我”与城市人之“自我”的二元对立关系,这不仅是一种空间想象(乡村—城市)中的对峙,还是一种时间意识(原始—现代)中的对峙。显然,沈从文向往前者(乡村与原始),并寄希望于前者。易言之,只有在乡下人之“自我”这里,沈从文才形成了自我认同;而在城市人之“自我”这里,他则将其视为自我的异化。自我认同,内蕴着对自我之主体性的理解,在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看来,它意味着“内在感、自由、个性和被嵌入本性的存在,在现代西方,它们就是在家的感觉”^{[9]1}。沈从文所肯定的乡下人之“自我”,其在空间想象与时间意识中建构的“自我”的诗学,正是一种“在家的感觉”。

“自我”的诗学的哲学内涵在于,城市人之“自我”已然在现代文明的塑造下扭曲,使得人成为城市机器的附属品,而丧失了原有的主体性与本真性。而乡村人之“自我”则展现了人之为本然状态,人虽然在世事变迁之中常常感到被动,但却并未受到来自社会的外在性力量的支配,因而保持着自身作为人的主体性与本真性。换句话说,乡村人之“自我”存在于一个自然的道德空间之中,而城市人之“自我”则存在于一个异化的社会空间之中。民间传说、神话想象与湘西世界,都是沈从文用以抵御现代城市文明的文学选择。在此,沈从文以原始的文明形态抵御着现代的文明形态。乡村文明运行着一个自洽的逻辑,譬如《萧萧》中萧萧与小丈夫之间的关系、与花狗大之间的关系——前者是一种年龄差距悬殊的婚姻,后者是源于自然欲望的“出轨”,而这二者都被乡村中的伦理逻辑容纳了。不过,沈从文更多地是在强调乡村文明中的纯真人性与淳朴民风。在这种回归自然与原始的时间意

识之中,沈从文寄寓着对人之“自我”在困境中突围的理想。不过,原始的乡村文明并非是一个永远充满快乐与希望的世外桃源,其中也有悲哀与无奈。譬如《边城》中翠翠的父母双双自杀、天保远走却意外而死。但这种悲哀与无奈是人之本真状态与自然感情的产物,而现代城市文明中的悲哀与无奈则是非自然的产物,甚至快乐与希望也常建立在人性的扭曲之上。然而,原始的乡村文明的野蛮性虽然也建立在自然性之上,但却具有强烈的破坏性。因此,乡村文明中的野蛮性无法像其中的悲哀与无奈那样,因其具本真性与自然性而被接受,它只能被取代。历史的选择是,以城市文明的理性精神取代乡村文明中的野蛮性。然而,这种取代并非一种部分的取代,而是一种文明的更迭。如前所述,在这一过程中,乡村文明意义上的本真性与自然性如野蛮性一样,被无情地去除了。而正是本真性与自然性的丧失,使得“自我”的诗学成了理想化的审美诉求。

对沈从文而言,“自我”的诗学来源于乡村文明,而敌视城市文明。沈从文曾表示愿将《龙朱》这篇小说作为薄礼献给本族人。他写道:“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的血液的我,二十七年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中着在道德下变成虚伪庸儒的大毒,所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勇敢、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再也不配说是出自你们一族了。”^{[6]85}这段话把沈从文所谓的“乡下人”之民族性表现得很清楚,也把“自我”的诗学的情感倾向与价值取向表达得很清楚。“自我”的诗学是以城乡对峙为基础的,其情感与价值都偏向于乡村文明。卡西尔(Ernst Cassirer)认为:“一切时代的伟大艺术都来自于两种对立力量的互相渗透。”^{[10]207}而正是内蕴着传统与现代之对立的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对峙,构成了沈从文运思与创作的“大时代”背景。也正是城市文明走向中心而乡村文明走向边缘的大时代,使得沈从文无法将乡村的自然视为纯粹的自然,而只能将其视为批判大时代的手段。正如他所说:“我于是渐渐失去原来与自然对面时应得的谧静。我想呼喊,可不知向谁呼喊。”^{[11]361}他将这种呼唤融进文字之中,因而使得其文学世界独有一种反抗性精神。

如果说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在进行着一场博弈的话,那么这场博弈注定会以乡村文明的失败告终。沈从文曾承认:“到底还是社会势力比个人能

力大,我是终不能用农民感情活到城市中的。”^{[2]196}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对峙,正是20世纪的现代化潮流中的二元冲突。其实,沈从文既然生活于城市之中,就已经说明他无法不接受城市文明。不过,他的接受乃是一种批判性的接受。这种批判性,正是通过在城乡对峙中突显乡村文明之“自我”的自然性与本真性实现的。由此可见,“自我”的诗学,不仅是一种“回归自然”的诗学,还是一种批判现代性的诗学。因此,“自我”的诗学便具有双重的文学意义:不仅为当时的文坛补充进一种基于自然之“自我”的乡土文学,还引入了一种基于自然之“自我”的社会反思乃至文明反思的批判性视角。刘西渭指出,沈从文的小说“具有一种特殊的空气,现今中国任何作家所缺乏的一种舒适的呼吸”^{[12]201}。这种“特殊的空气”正来源于体现着沈从文边缘意识与本真意识的乡村空间,这种空气令人舒适,但却并不肤浅。因为内蕴其中的“自我”的诗学不仅在审视“自我”状况之后呼唤着“回归自然”,还在城乡对峙的基础上进行着现代性批判。

[参 考 文 献]

- [1] 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 [2] 沈从文.沈从文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 [3]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 [4] 沈从文.边城[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 [5]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刘绍铭等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 [6] 沈从文.媚金·豹子·与那羊[M]//沈从文.萧萧.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 [7] 帕克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M].宋俊岭,郑也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8]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M].广州: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 [9]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 [10] 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 [11] 沈从文.沈从文散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12] 刘洪涛,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程晓芝)

Poetics of “Self”: Spatial Imagination and Time Consciousness in Shen Congwen’s Novels

ZHU Zhao-b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of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In Shen Congwen’s novels, the dual opposite structure of rural civilization and urban civilization contains a profound “self” poetics. There are two kinds of “self” in Shen Congwen’s novel: the first one, recognized by Shen Congwen, namely the countryman’s self, is expressed in the rural space by the edge of consciousness and awareness of true expression; the second one belongs to the modern people, featuring “self alienation” that is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modern city civilization. The former expresses Shen Congwen’s aesthetic confirmation of his self-consciousness in the space of imagination, while the latter shows the dilemma and contradiction of the modern man in the time consciousness. The Poetics of “self” originates from the rural civilization, emphasizing the subjectivity and authenticity of human being, thus forming a critique of modernity.

Key words: Shen Congwen; self; space imagination; time consciousness; criticism

.....
(上接第 75 页)

A Study of Han Shih from Song Dynasty to the Contemporary Era

LV Guan-nan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250100)

Abstract: Han Shih, initiated by Han Ying, onc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research the Book of Songs in Han Dynasty, however, all its works except Han Shih Wai Chuan extincted in the Song Dynasty which also witnessed a new start of the academic study of Han Shih School and saw the appearance of the first version of Han Shih Wai Chuan and the first supplement of the lost works of Han Shih. Studies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mainly concerned Han Shih Wai Chuan, while Qing Dynasty scholars studied both Wai Chuan and lost works of Han Shih. And in the contemporary age, studies of Han Shih is broadened and widened. These achievements have great values in the future study and are worth introducing.

Key words: HanShih; Han Shih Wai Chuan; academic history; supplement; coll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